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传统的发明

[英国] E. 霍布斯鲍姆 T. 兰杰 编

顾杭 庞冠群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传统的发明

[英国] E. 霍布斯鲍姆 T. 兰杰 编
顾杭 庞冠群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的发明/(英)霍布斯鲍姆(Hobsbawm, E.), (英)兰杰(Ranger, T.) 编;
顾杭, 庞冠群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8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书名原文: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SBN 978-7-5447-0693-3

I. 传… II. ①霍… ②兰… ③顾… ④庞… III. 传统文化—研究—英国
IV. G1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7588号

Copyright © 1983 by E. J. Hobsbawm, Hugh Trevor-Roper, Prys Morgan,
David Cannadine, Bernard S. Cohn, Terence Rang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0-118 号

书 名 传统的发明
编 者 [英国]霍布斯鲍姆 兰杰
译 者 顾 杭 庞冠群
责任编辑 胡传胜 陈 叶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顾晓军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新博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 × 1304 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87千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0693-3
定 价 2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凤凰文库学术委员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秀山 刘 东 江晓原 许纪霖 杜继文
李学勤 李 强 汪 晖 张一兵 张海鹏
陈众议 郭齐勇 洪银兴 钱乘旦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谭 跃
副主任 陈海燕 吴小平
成 员 刘健屏 黎 雪 张胜勇 王瑞书 吴星飞
顾华明 姜小青 黄小初 顾爱彬 刘 锋
余江涛 吴 迪 吴 源 胡明琇 章祖德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

主 编 刘 东
项目总监 刘 锋 彭 刚
项目执行 李瑞华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编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

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点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经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

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译者的话

面对“传统的发明”这样一个新奇的题目，我们难免心生疑问：本应在时间的长河中缓慢积淀而成的传统如何被发明、创造？本书的六位作者以一组精彩的论文告诉读者，许多所谓的传统实际上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被建构出来的，它们貌似悠久，实乃晚近的发明创造。这些论文主要讨论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英国及其殖民地发明传统的情况。

休·特雷弗—罗珀与普赖斯·摩根分别考察了苏格兰与威尔士构建民族象征物、重塑民族传统的进程。面对英格兰的统治及其语言、文化的入侵，苏格兰与威尔士的“爱国者们”力图通过颂扬各自的民族特性来保持文化上的独立性，并加强其民族认同。特雷弗—罗珀的研究指出，17至18世纪的苏格兰并没有独立的传统，所谓独特的高地传统乃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完成的追溯性发明。他着重揭示了苏格兰高地传统的典型象征物——克兰格子呢褶裙的真实起源。苏格兰褶裙的样式出自英格兰的工业家之手，以格子呢的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则由投机的格子呢制造商们首创。耽于幻想、试图通过想象与虚构来塑造高地文明的艾伦兄弟撰写了《苏格兰的衣橱》和《克兰的

装束》，这两本书凭借捏造的史实强化了克兰格子呢起源悠久的观念，重构了苏格兰业已消亡的克兰体系。与苏格兰人创造高地传统相比，摩根所展示的威尔士人文化发明的内容则更为丰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威尔士旧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已然衰微甚至消亡，当地的学者和爱国者们自觉行动起来以保存、发展威尔士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追寻往昔，不断地复活并改造传统，甚至创造传统，比如：复兴衰落已久的威尔士诗歌大会；认定威尔士民族的凯尔特起源；提高威尔士语的地位，强调其纯洁性，甚至将其描述为一切语言的根源；将英格兰歌曲威尔士化，并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从而把威尔士塑造成古老的音乐之乡；制造民族英雄马多；保护地方风景，赋予其历史与人文意义。这些尝试共同构建出一种新的威尔士特性。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转向了政治传统的发明。大卫·卡纳迪恩分析了1820至1977年间英国王室仪式精致化的过程，他将礼仪放置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之中考察其变迁，揭示仪式表演所暗含的意义。作者发现，英国王室盛典的“千年传统”绝非如此悠久，直至19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王室仪式仍是十分笨拙、魅力有限。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君主的真正权威逐渐衰落，却成为了民族的领袖，受大众崇拜，被盛大的仪式庆典所环绕。若从国际环境着眼，此时国际关系日益紧张，各国仪式上的攀比也是展示竞争的手段。至20世纪前期，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一个发生剧变的年代，君主制礼仪成为了表达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它被人们描绘为悠久传统的化身。

博纳德·科恩与特伦斯·兰杰的研究视野拓展到了英帝国的殖民地，讨论了欧洲的传统是如何被移植到印度和非洲的。科恩关注的是，19世纪英国统治者如何建立起一种向印度人展示英国之权威的仪式风格。1858年之前，由于莫卧儿皇帝仍然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核心象

征,英国人无法用象征手段将印度人吸收进他们的统治之中。因为存在文化差异,英国人在沿用印度本土的礼仪时大大改变了其意义。1858年后,维多利亚女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要,英国统治者要在印度建立新的认同中心,并且要以仪式、象征的手段将印度的王公贵族纳入到新的等级秩序之中。实际上,印度总督以欧洲的模式以及相关的礼仪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以换取他们的忠诚。科恩重点考察了1877年的帝国集会,正是这次集会以仪式活动与象征手段展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威以及印度王公与女皇的关系。以往的研究仅将1877年的集会视作无聊的表演,科恩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次盛会奠定了一种仪式风格,成为了印度人和欧洲人衡量公共仪式的标准,更意味深长的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也深受其影响。

兰杰阐释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展示了发明传统的复杂图景,它至少涉及三个层次。首先,为了将非洲的白人定居者转变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殖民者不仅依靠军事或经济的力量,还通过移植或发明新传统来显示白人乃是非洲人的主人。因此,殖民者在非洲发明出了一整套学校、职业和军团等传统,它们可以用来创造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其次,在非洲缺乏广泛存在的君主制的情况下,英国统治者创造了一个本土的君主制传统。因为殖民政府不希望通过不断运用武力来实施统治,所以它需要寻找更多的本土合作者,尤其是乡村的首长、村长和长老等人,而这种合作背后又需要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结果殖民者在帝国君主制思想中找到了这种意识形态。于是,行政官员对非洲人不断灌输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神的观念,并通过仪式活动使这样的观念更具影响力。再次,英国统治者还

为非洲人发明非洲传统,他们整理、传播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现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建立新社会。

除了以上各篇论文,本书的编者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撰写了导论和最后一章。在导论中,他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发明性传统做了理论上的概括。在最后一章中,他试图将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应用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提出一战前的三四十年是欧洲大规模生产传统的年代,这一时期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化导致了新传统层出不穷。这些传统既包括官方创造的政治传统(比如公共仪式、纪念碑和雕像),也包括非官方的群众运动、社会团体发明的各种传统(比如五一劳动节、足总杯决赛、温布尔登公开赛、校友协会),它们的出现或是强化了对国家的顺从与忠诚,或是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中产阶级的团体认同。文集通常给人以松散、拼凑之感,而霍布斯鲍姆的开篇与末章赋予了本书一种整体感,并使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成为认识 19 世纪欧洲历史的新视角。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深深叹服各位作者的博学,文中详尽的史料、坚实的论据、精辟的分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的同时,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本书自 1983 年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今天,“传统的发明”一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它作为标题出现在许多不同种类的论文之中。

庞冠群

2008 年 7 月

撰稿者：

大卫·卡纳迪恩(David Cannadine)：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著作包括《领主和地主：贵族统治和城镇，1774—1967年》(1980年)、《英国贵族统治的衰亡》(1990年)。

博纳德·S.科恩(Bernard S. Cohn)：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著有很多关于历史与人类学的相互影响和印度社会研究的论文。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经济与社会史荣誉退休教授，《过去与现在》杂志创始人之一。他著述甚丰，其中有《1780年以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进程、神话与现实》(1990年)。

普赖斯·摩根(Prys Morgan)：

斯旺西的大学学院历史讲师。他已出版了大量有关威尔士的著作，并参与了很多有关威尔士历史的书籍的撰写。

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

牛津大学罗兹种族关系学教授，圣安东尼学院研究员。他著有《非洲宗教历史研究》(1972年)和《东非舞蹈与协会》(1975年)。

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

格兰顿的戴克爵士，1980—1987年任剑桥大学彼得学院院长。1957年起曾任牛津大学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

目 录

主编序 1

译者的话 1

第一章 导论:发明传统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1

第二章 传统的发明:苏格兰的高地传统 休·特雷弗—罗珀 16

第三章 从衰亡到景致:浪漫主义时期对威尔士历史的追寻
普赖斯·摩根 48

第四章 仪式之背景、表演与意义:英国君主制与“传统的发明”,1820—1977
年 大卫·卡纳迪恩 115

第五章 维多利亚时期印度的权威表象之确立 博纳德·S.科恩 191

第六章 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 特伦斯·兰杰 239

第七章 大规模生产传统:1870—1914年的欧洲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300

索 引 350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的盛观显得是如此古老,并仿佛与无法追忆的往昔紧密相联,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匹敌。然而,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证实的,现代形式的这种盛典事实上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的产物。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熟悉古老的英国大学中学院情况的人将会记起此类“传统”是如何在小范围内确立的,尽管某些传统——如圣诞节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附属教堂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经》选读和圣诞颂歌节(Festival of Nine Lessons and Carols)——通过广播这一现代大众媒体已变得家喻户晓。这一认识构成了由历史杂志《过去和现在》组织的一个讨论会的出发点,并由此奠定了本书的基础。

“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英国国王的圣诞广播讲话(确立于 1932 年)就是前一种传统的范例;与英国足总杯决赛相关联的实践活动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后一种传统的代表。很明显,这些传统将不会同

样长久,但是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情况,而不是它们生存的可能性。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世纪重建英国议会大厦时有意识地选择哥特式建筑风格,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议会会议厅时,同样有意识地决定采取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基建图。将新传统插入其中的那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并不需要是久远的、于时间迷雾之中遥不可及的。依照定义可谓与过去决裂的革命和“进步运动”,也有和自身相关的过去,尽管它可能在某一日期被截断,例如1789年。然而,就与历史意义重大的过去存在着联系而言,“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使得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传统的发明”如此着迷。

此种意义上的“传统”必须与支配所谓“传统”社会的“习俗”清楚地区分开来。“传统”,包括被发明的传统,其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与这些传统相关的过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发明的,都会带来某些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动,譬如重复性的行为。传统社会的“习俗”则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它所做的是,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研究农民运动的学者明白,一个村庄“根据亘古以来之习俗”对公地或是权利的要